

书院学校

庠序之教遍余姚

余姚历史悠久，文风特盛，历代名贤辈出，素有“文献名邦”之佳称。早在清初，就有人赞誉说：“姚江人物甲天下。”这一结果之取得，全在于教育之兴盛。正如明代学者张岱所言：“唯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由于姚江人注重读书育人，历来多科举人才，形成“余姚代称多才，遭际选举者多矣”的现象。按《光绪余姚县志·选举志》统计，自宋代至清光绪二十五年止，共有进士612人，其中尤以明代为最盛，达387人。更有明嘉靖十四年（1535）乙未科，余姚一县考中进士的多达17名，为全国之首，其中头名状元、二名榜眼均为余姚人所得。另有武进士63人。进士中有状元5人（宋代2人，明代3人）。此外，在明代，余姚人中因学问渊博，名震朝野，被皇帝下诏特征或举荐的有108人次。在众多的学人之中，学者占较大比例，出现了较多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这是余姚人物的一大特色。其中如心学大师王阳明、浙东史学鼻祖黄梨洲、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朱舜水、浙东学术的殿军邵二云等，更是姚江士林中之奇秀。

人才之兴，基于教育。余姚的教育历来以学宫、书院、社学、私塾教育为主。早在汉代，余姚已创建县学，据《后汉书·黄昌传》可知，初建时的学宫在黄昌故宅附近，即姚江南岸，现今的大黄桥路西侧，黄昌曾因之“数见诸生修庠序之礼”。至宋庆历七年（1047）时，学宫毁败，即有县令谢景初依制重建。元丰元年（1078），县令黄铸向邑人莫当等募捐，买地于现在的学弄内，迁建学宫于此。东侧有举弄，西侧有糞弄，背依醱醱弄，正门前即改称为学弄。学弄南侧过射圃桥有泮池、射圃；东边为棖星桥，西边为明伦坊。学宫内东轴线为孔庙，崇圣祠祀先师孔子，旁列配享；有土谷祠、文昌阁、魁星阁、训导署、教谕署等。中轴线有棖星门、儒学门、东西庑廊、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西轴线有乡贤祠、名宦

祠、忠义祠、斋堂、号舍等。置学谕、明清两代设、教谕、训导、直学、斋长、斋谕等教职，教育在学生员。黄宗羲在《余姚县重修儒学记》中写道：“今之天下学脉不绝，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学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来，凡国家大节目，必吾姚江学校之人出而搢定。”自学宫创建以来，在近2000年中，曾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历代秀才、举人、进士，均出于此，学宫之功可谓大矣。

姚江两岸亦多书院，均为有心于教育之学人募集资金合力倡办。按文献查知较著名的有：

高节书院在客星山，宋咸淳七年（1271）由制置使刘黻、邑人何林等倡议，将严子陵墓道之左的高风阁改建为高节书院。前为夫子祠，后为夫子宴居，有义悦堂、思贤堂、学斋4间。元代时曾增建大成殿，形成规模。明洪武中期，被千户刘巧拆毁，取书院材料移迁三山所演武厅，高节书院遂被湮废。

怡思书院在四明乡，由宋代修职郎孙一元所建。同时创有“炉溪文社”。废于明代。

古灵书院在冶北屯山的南坡，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建，规制恢宏，著名学者危素写有《古灵书院记》。废于明代。

南渠书院在城西的丰山前，由明嘉靖年间大学士吕本的学生、浙江巡按张科、王廷聘出资，由官方督建。内有乐贤堂、丰乐楼、后乐轩、捧日轩、停云轩，朝夕聚友讲学。

复初书院在胜归山刘将军庙前，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建，废于清初。

姚江书院，明崇祯十二年（1639）由沈国模、史孝咸等创建于城南半霖史家宅，祀先贤王阳明先生。订立《姚江书院训约》，严肃学人的风规。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迁至南城巽水门内角声苑。在清代禁止“王学”的形势下，坚持讲学，成为浙东传播“阳明学说”的大本营，一直到民国时期，长盛不衰。书院遗存建筑一直保存到1992年才被拆除。

丰乐书院在龙泉乡，由绍兴知府李公铎建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废于乾隆年间。

信成书院在剑江，乾隆九年（1744）由知县蒋允焄以剑江庵改建，不久圯于水灾。乾隆二十四年由知县刘长城撤其材做建龙山书院之用。

龙山书院在龙泉山中天阁，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县刘长城创建，每岁延师课士，至清末停学。

文蔚书院在三山所城（浒山），同治二年（1863）由巡检李协恭和邑人陈志衡等捐资所创建，至清末尚存。

由于在古代官制教育中，一般不包括蒙养教育，启蒙教育的担子均由民间私学来承担。民间学校名目众多，有书馆、村校、乡校、家塾、私塾、冬学等。

自唐宋时期起，余姚即有私塾教育存在，无固定教育年限，不分班级，没有上下课。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以生活常识、诗文、历史知识、博物常识、伦理道德等内容做教材，循序渐进，严格训练。全县大部分子弟都依靠私塾教育获得基本知识。自元代始创社学，每社立社学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时使子弟入学。明洪武八年（1375），朝廷颁布诏令推行社学，凡府、州、县每50户各建一社学，延秀才教诲子弟。余姚承制于四隅及乡之35都各建社学一所。后因私塾渐兴，至明晚时期社学渐废。社学既有教学知识的任务，还负有社会教化规劝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姚江两岸的义塾、社学、私塾较著名的有：

吕氏义学由宋代吕次姚所创建，在城内东北隅，有屋50间，礼致名儒湛若为师，远近就学者多达数百人。不知何时所废。

通德乡义学在黄竹浦，明代黄伯川所建，废于清代。

凤山义塾在临山卫城东门内，同治十年（1871）由卫人购杨姓屋改建为义塾，延师课士。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办为凤山两等小学堂。泗门存著义塾亦于同治十年创立。

杜家团三管义塾在上林都，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建。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帝下诏变法维新，广设学堂，遂由邑人叶秉钧、史翊经等创办达善学堂于原试院，由叶秉钧担承堂长，试行新式教育；后改为县高等小学堂。光绪二十八年，由东山、兰风、开元三乡士民捐资创办私立诚意高等小学堂，至民国十三年（1924）冬改为私立诚意商校，至民国十九年奉省教育厅令再改为私立诚意商科职业补习学校，民国二十六年改办为诚意完全小学，1950年改名为县立泗门小学。光绪三十年，由士绅蒋怀清等于达善学堂设余姚师范讲习所，附设初等小学堂。两年后与县高等小学堂合并。天华乡创办私立咸正小学堂。光绪三十二年，邑人黄守斋于梁弄创办正蒙小学堂，为梁弄中心小学前身。邑人郑梦麟等创建溪山学堂于郑巷。何丹书独资创办丹书小学堂于回龙。光绪三十三年，邑人陈依仁于二六市乡创办鸡鸣小学堂。

依据《教育会章程》，于光绪三十四年成立教育会余姚分会，蔡振铎任会长，张宝琛任副会长。举人谢宝书等捐资创办余姚汝湖初等农业学校，邑人鲁载道于北城候青门创办女子小学堂。

清宣统元年（1909），开元王氏星公义庄捐资开办瑶湖小学堂。丰山宋氏创办丰溪小学堂，宋氏子弟免费入学。至1950年改为县立丰山小学。由于慈溪县城（慈城）谣传学校要加捐税，群众不明真相，引起一场毁校风波，官桥鸡山小学被焚毁。宣统三年创办宪元小学堂以及牟山乡魏家小学堂。

待民国肇造，对私塾采取限制与改良的政策。民国元年（1912）一月，按教育部令，县内学堂统改称为学校，学堂堂长改称校长。各乡亦先后设立小学，动员子弟入学读书。

民国三年八月，省政府令调查学龄儿童，一时谣言四起，传称查学龄儿童生辰是拘勾儿童灵魂做镇塾百官铁路桥脚之用，引起不少乡镇掀起捣毁学校风潮，直至派兵弹压才得以平息。

民国五年，全县划分为5个学区，是年，全县已有学校114所，有学生5000余人。至民国十二年，全县有小学校228所，学生12000余人，专任教

员695人。

民国十四年（1925），余姚各校师生3000余人于中山厅集会、游行，抗议上海“五卅惨案”。民国十七年六月，余姚通俗教育馆改称民众教育馆。第二年，由县教育局主编《余姚教育》半月刊，专载讨论教育学术、教育方法及小学教育实际问题的文章。

民国十八年拟定《余姚县管理私塾办法》，提倡办改良私塾，必须按教育部颁发的教育计划和教科书教授学生。待至民国二十八年，全县有私塾260所。私塾教育一直存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据1950年1月统计，当时有改良私塾47所，塾师52人。至1952年9月，全县小学为国家全部接收后，私塾不再存在。

民国十九年二月，南城学弄邵氏小学改称为康节小学。当年全县共兴办民众学校21所，群众问字所57所，群众阅字牌67块，掀起了第一次群众性的识字运动。至此，全县共有小学267所，共479学级。第二年，由邑人史久鳌、潘久芬等发起创办育才幼儿园。民国二十四年秋，创办实获中学，地址在酱园街，是为余姚第一所中等学校。实获中学曾一度停办，至民国三十三年于原校场营建新校舍后，改名为余姚县立初级中学，是为现余姚中学的前身。同年11月，鲁迅艺术学院浙东分院在陆埠杜徐村建立，由黄源兼任院长，第二年春迁至中共浙东区委近旁的宣家塔村，至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而随之停办。民国三十五年，成立余姚县国民教育研究会，使得余姚的民众教育进入新的阶段。

1949年6月，余姚县军管会接管学校，最先接管的是简易师范、县立中学及一小、二小、三小等。8月，余姚县人民政府设立文教科，加强对全县文教工作的领导。10月，成立余姚学生联合会。1950年，农村兴办冬学，全县有冬学448所，有34000多人参加学习。1956年8月，撤销县文教科，成立余姚县文教局。同时建立县体育运动委员会。“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社会上“文攻武卫”的发展，全县中小学校停课闹革命，学校陷于混乱状态，内战不休，教师横遭迫害，校园遭受严重破坏，教育无法正常进

行。1978年12月，撤销文教局，分别设立教育局和文化局，恢复局长制，设立局党组。是年全县有小学633所，有初中269所，有高中16所。1989年3月，撤销市教育局，建立市教育委员会。2001年，撤销市教育委员会，改设市教育局。

姚江书院史话

在余姚城内原有一座古老的书院，即创建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的“姚江书院”，它是明清之际浙东地区传播阳明学说的大本营。

自从明代中叶有王阳明创立“阳明心学”，追求独立意识和个性解放观念，解放了世人的思想，使人们从已僵化的程朱理学中解脱出来，给人们以清醒和自觉，为东方儒学的发展拓展了新的道路。由此，不少学人纷纷向王阳明拜师求学。不及亲见王阳明的学子，虽未能向王阳明求教受业，亲聆教诲，但敬仰阳明学术，尊王阳明为先师，或自习，或转相传授，尊奉“致良知”之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阳明心学的学术群体。因创立者王阳明是余姚（姚江）人，世人即将这一学术群体称为“姚江学派”。

由于王阳明在故乡余姚传授有众多学生，尤其有徐爱、钱德洪等著名学生遵循王阳明之教，力排腐儒对“王学”的讪谤，使得“王学”得以发扬光大，阳明心学传授不绝。时至明崇祯年间，又有沈国模、史氏兄弟创办“姚江书院”。“姚江书院”即是由明末余姚的一群学术观点一致的学者为传播阳明学说而创立的一个教研活动基地，并因讲学该书院形成了影响卓著的“姚江书院派”，它与绍兴的“蕺山派”、嵊县的“石梁派”鼎足而三，是明末清初浙东阳明学术的支派，成为明清之际传播阳明心学的主要场所。正如清代著名学者邵廷采所说：“姚江讲学之盛，前称徐（爱）、钱（德洪），后称沈（国模）、史（孝咸）焉。”（《思复堂文集·姚江书院传》卷一）

姚江书院的创办人沈国模（1575—1656），字叔则，号求如，晚年居住于横溪石浪山，又号石浪老樵。他是钱德洪学生的学生，是王阳明一脉真传弟子。他对王阳明的《传习录》用功甚勤，深得“良知”学说的本旨，立下了“以倡明良知为己任”的决心。他到嵊县拜谒王阳明学生王畿的学生周汝登。经交谈，周汝登发现沈国模学问高深，但在观点上与已有

异，难以共存，就借口年老，谢绝了沈国模。沈国模就跑到绍兴，找阳明后学刘宗周和陶奭龄，共同切磋学问。崇祯二年（1629）周汝登死，他的学生启请刘宗周、陶奭龄开辟讲会，地点分设在陶文简祠、阳明书院、白马岩居3处，轮番举行讲会，取名为“证人社”，并邀请余姚沈国模参加证人社讲。时过不久，终因学术观点的不同，明显地分为陶奭龄派、刘宗周派、沈国模派。他们的分歧在于：陶奭龄喜欢援佛入儒，刘宗周力主“诚意”，沈国模却是坚守儒家门庭，一心避佛。“其学以求仁为宗，教人当下察，取本心扩充克治”，属于现成良知派。特别是他的“知人、安民”思想，比较切近普通百姓的思想实际，因而受到“野叟村童”的欢迎。到崇祯九年，陶奭龄拉了一帮弟子专讲于白马岩居，刘宗周分讲于绍兴蕺山，沈国模即回到余姚，在余姚城南别开“尚友堂会”。原是刘宗周学生的王朝式亦投到沈氏门下，携母迁居余姚听讲。如此一来，陶、刘、沈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崇祯十二年（1639）九月，沈国模以绍兴讲会较盛，而阳明故乡的龙山书院反而久废不聚为由，认为应该以义学作为基础，创立学校。于是会同管宗圣、史孝咸、史孝复等，在城南双雁里半霖史家买下沈氏旧宅做校舍，创立“义学”，即姚江书院的前身（顺治十四年，即1657年正式定名为姚江书院）。此举也得到刘宗周、陶奭龄、祁彪佳以及“证人社”其他诸君子的赞成和协助，有绍兴知府王某、余姚知县袁定及施邦曜、禹元璞等出资助之。院内堆筑讲坛，前为堂，中堂悬挂孔子像；后为楼，奉王阳明像，以徐爱、钱德洪配享。具体修葺布置、征集藏书等有邵曾可、沈之骏主持。经过两年的准备，于崇祯十四年竣工开学。严定学规，学生“寝食其中，月季大小会，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俊彦咸在。目击心喻，直从文成（王阳明谥号）溯洙泗，逮濂洛，朱陆异同并收，期于躬行有所得而已”（《思复堂文集·姚江书院记》）。沈国模每日按时到校，亲自授课。其他有史孝咸、俞长民、韩孔当、邵元长等先后主讲“良知”之学。至崇祯十五年，已形成格局完整的书院体系，发挥祭祀、藏书、讲学的三

大书院功能。

清康熙中期，在俞长民的主持下，书院曾序刻《阳明王子全集》以行世。正如邵廷采所说：王阳明“倡明正学，高达之士风趋影从，阳明书院之在宇内者七十二，而浙中居其六”（《思复堂文集·姚江书院传》）。姚江书院即为其中之一。半霖义学的创立，并不是为了要和戴山刘宗周、石梁陶奭龄争学术地位，而是为了在阳明故乡延续“姚江一灯”，它标志着姚江书院派的正式形成。

作为书院，它不仅是学子们攻读诗文之所，更是学者们论理辩学、祭祀先贤、收藏书籍的学术机构。姚江书院虽无法与闻名全国的大书院相比，但它在我国文化学术史上，尤其是在“王学”和“姚江学派”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崇祯末年，由于时局的突变，明廷崩溃，大清铁骑入关、南下，绍兴的“证人社”停止了讲学，唯有刘宗周学生黄宗羲坚承师说，重创证人书院于甬上。石梁陶奭龄也中止了讲学。沈国模指导下的姚江义学却能长期坚持讲学，每月有讲会，讲学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即使清兵入浙东，他们在躲避战火之余，仍念念不忘讲学。正如史孝咸所说：“陵谷容有改更，万古不靡惟学问耳。”（《姚江书院志略·书院任事约》清乾隆五十九年刻本）至清顺治六年（1649），兵战稍息，姚江书院讲会重新兴盛。新定《书院会则》，明确规定：“言论各须虚怀下气，不得哗然。并举接耳私谈，毋及朝廷时事，里中俗语及世态寒温，亦不得塞默无言，矜傲自是。”（《姚江书院志略·会则》）并完善了书院的管理体系。顺治十三年，沈国模卒。顺治十六年，史孝咸卒。继承主持姚江书院的先后有韩孔当、俞长民、史标、邵廷采、徐景范等，他们一心宗主阳明学说，姚江书院的讲学活动仍一派热闹繁盛。

姚江书院的兴盛，是经过较长时期的奋斗才取得的。自王阳明创立阳明心学之后，后学学不一途，尤其当王阳明死后，其门人各以己见掺和，说玄说妙，测度想象，或折之为数家。更由于王阳明在世时即已功高遭

忌，位隆遭谤，影响到对他的学术评定。王学以其对主体意识的开放性，冲决了程朱理学封闭性的堤防，引起了道家们的恐惧，致使王阳明死后在地底下仍不断地挨骂。王阳明去世不久的嘉靖十六年（1537）二月，即有御史游居敬疏斥王阳明的学友、时任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倡其邪说，而令所司毁其书院……十七年四月，吏部尚书许赞请毁书院”（《续文献通考·学校》）。甚至要求禁毁王阳明书籍，禁绝王氏学生讲学。到万历元年（1573），首辅张居正竟然下令尽撤天下书院。张居正死后的万历十二年，朝廷颁布“以王守仁从祀孔庙”（《明史·礼志》），又招来不少反对者，时有兵科给事中赵思诚上奏说：“不禁其书、禁其徒，又从而祀之，恐圣学生一奸窠，其为世道人心之害不小。”（黄云眉《明史考证·王守仁传考证》）吏部文选司郎中唐伯元也说：“危哉心乎，而敢言心学乎。心学者以心为学也。心学者为其求心也，心果待求，必非与我同类。”（顾炎武《日知录·心学》卷十八）他们都以阳明心学的开放性对封建旧秩序造成冲决而感到恐惧，演而成为对阳明学说的猛烈抨击。

到清初，江南地区反清义师所在皆起。清统治者在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民族残杀政策与军事镇压的同时，对汉族传统的思想文化，特别是有关民族意识的观念采取极力抑制的政策，明令“不许别创书院”，以政治手段来确立程朱理学的独尊格局，对思想文化领域严加控制。这一禁令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才开始有所松动。面对如此局面，主持阳明学说的一些大儒，要想固守阳明心学的营垒，已经难乎其难了。

就在对阳明学说极力诋毁的局势下，作为王阳明故里的余姚，讲授阳明学说的风气从未衰息。自王门高弟徐爰、钱德洪始，后经沈国模、史孝咸、邵曾可、邵廷采至邵晋涵等，代有传人，经久不息。讲授阳明心学的场所除姚江书院外，尚有县儒学、城内龙泉山上的中天阁讲学堂（乾隆时改称龙山书院）、南渠书院、复初书院、丰乐书院、信成书院、通德乡义学等，均以“良知”为讲授课目，而姚江书院乃是传播阳明心学的中坚，在最高统治者的禁令面前未曾退缩，实属难能可贵。

清康熙八年（1669）始，由沈国模嫡传弟子韩孔当（1599—1671）主持书院事务。韩孔当去世后，继任院事的俞长民、史标等还开始与黄宗羲接触，曾于康熙二十八年元夕，邀请已80岁高龄的黄宗羲会讲于姚江书院，绍兴知府李公铎、余姚知县康如璉亦莅听讲。当时虽在学术上仍存在较大差异，互存异见，但总算有了学术交流。到邵廷采主持书院事务时，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

黄宗羲是余姚名儒，书院就在他家西南，但碍于门户观念，黄宗羲较少与书院派交往。俞长民主持书院事务期间，书院对崇祀问题进行讨论，特邀请黄宗羲商定崇祀。黄氏对书院旧的祀法有不同看法，特作《附议》一文。大意谓王阳明是全国的王阳明，“今以姚江名书院，而单举一邑之门人”，不妥，收录的王门弟子就应该全一些，像王门姚江弟子徐珊、管州、孙应奎、柴凤、范引年、夏淳、闻人铨、董骥、胡瀚8个人都应补上。今所见书院《祀典》，确有这8人，说明书院弟子们还是比较重视黄宗羲的意见的。由此推测，黄宗羲对姚江书院是有所关注的。进而可知，后来有邵廷采求教于黄宗羲，也是有道理的。

姚江书院祀先贤王阳明，重自由讲学之风，弘扬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是明末清初浙东两个十分重要的王学流派之一的“姚江学派”的活动中心，传播“阳明学说”的大本营。

姚江书院强调“进德修业”，力求言行一致，反对“趋炎附势、把持乡曲”。这从院规上可见一斑：一、阐致知之蕴，为学须精切探求，阐明“致良知”深义，躬行实践；二、“合证人之旨”，立诚为首，为学不能有半点虚假；三、“申鹿洞之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四、“加敏求之功”，应“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乘不拔之志”，要严于操守，持之有恒；六、“究当世之务”，要关心社会。

先后主持姚江书院17年的邵廷采（1648—1711），字念鲁。在他未滿10岁之时，就由他祖父邵鲁公携带至姚江书院，拜见沈国模、史孝咸。年

20岁时，即拜韩孔当为老师。他精通文史，对乡邦文献及遗民孤臣逸事尤加关注致力。因淹滞科场，以教授为业。康熙三十三年（1694）起主讲姚江书院。就在邵廷采主院事期间，感到书院地处下湿之区，离县城又较远（去城五里），学子多为不便，经他提议，遂于康熙四十一年十月将书院由城南的半霖迁入城南南溟门内巽水门角声苑（现巍星路菜场之南侧），恢复旧观，给学子带来极大的便利。到晚年，邵廷采潜心著述，至死不辍。

邵廷采著作众多，他继承黄宗羲重视晚明历史研究的传统，探求明代灭亡的原因，表彰宋明忠烈之士。他仿黄宗羲《行朝录》，著成《东南纪事》和《西南纪事》二书，专门记载南明政权匡复始末的历史，被梁启超誉为“有系统的著述”，“有永久价值”。其所作《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二书，使那些不入正史的遗民事迹得以保存下来，寄寓故国之思、民族气节。邵廷采还撰著《王门弟子传》《姚江书院传》《姚江书院后记》等，对阳明学进行总结和研究，基本反映阳明学派的面貌，可与《明儒学案》互补缺失。他还在他祖父邵曾可和书院门人遗稿的基础上，请董瑒补撰传文，汇辑而成《姚江书院志略》二卷，此书是研究姚江书院及阳明后学传授情况的第一手资料。邵廷采去世后，门弟子合记邵廷采所作文序杂文，编之为《思复堂文集》20卷。

姚江书院在明末清初天下书院衰落之际，能够独立于浙东，学业兴盛不衰，成为当时传授阳明学术的大本营。正如姚江书院正厅前的一副楹联所写：“学术允能成一派，典型猷自有千秋。”

黄澄量与五桂楼

黄澄量（1768—1819），字式筌，号石泉。按《梁弄黄氏宗谱》载，出生于乾隆三十三年，去世于嘉庆二十四年，享年52岁。余姚县四明乡梁弄人，诸生，是清代浙东著名的藏书家。

黄澄量曾拜乾隆二十五年榜眼诸重光为师，笃志力学，于书无所不窥。因父母过早去世，家事拖累，未曾参加科举考试。由于对书籍的嗜好，每当发现有好书，就不惜出重金求购，买不到就抄。每天购书抄书，与书为伴。他曾作《书睡》诗云：“生年未卅岁，夜睡曾不足。若非书中寝，一日终蹉跎。”这正是他嗜好藏书的自我写照。由于黄澄量对书籍的穷年搜寻，“凡聚书五万余卷，别本重复者又数万卷”。为了珍藏这为数浩大的卷轴，于嘉庆十二年（1807）在宅旁建造一座木结构三开间藏书楼，度藏卷轴。他认为：“积财与子孙，不如楹书与子孙。”故“建楼储之，以贻子孙”。因他敬慕宋代时的远祖兄弟5人并著清望，人称“五桂”，就以“五桂”名楼。

早在五代后唐时，青州黄氏有黄宗远，任越州别驾，见余姚梁弄山水佳美，即落户余姚县四明乡梁弄，为梁弄黄姓始祖。传至南宋绍兴年间第六世孙时，有兄弟8人，即开、闾、阁、闻、闾、闾、闾、闾。均因勤奋好学，学问博洽，被当时人称为“黄氏八龙”。据《梁弄黄氏宗谱》载，黄开，字必腾；黄闾，字必谦；黄阁，字必升，3人同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黄开，任秘阁修撰，观文殿学士兼尚书；黄闾，为文思院监授朝奉大夫，进金紫光禄大夫，太子侍读；黄阁，官苏州刺史，兵部诸军审计司军器监。黄闻，字必明，绍兴三十年进士，翰林院学士，知建宁府，进右朝议大夫，吏部侍郎兼太子詹事；黄闾，字必诚，乾道五年（1169）进士，御史大夫，任海盐令升中宪大夫，集英殿修撰。是时，兄弟5人同朝为官，深得宋高宗赵构的信任，被称为有“经济之才，宏博之

学”，赞誉说：“志冲霄斗，学优圣域，言动端庄，冠裳整飭。盖翼翼乎敬君之心，又悄悄乎忧民之色；将谔谔乎尽台评廷辨之词，欲蒸蒸乎助厘政承宣之力。用能布深，仁著休绩，而惜未底其极。”有史以来，兄弟5人同朝为官者极少，成为难得的传世佳话。后兄弟5人衣锦荣归，宋高宗赵构又赠《五子还乡诗》一首，并序曰：“卿昆季辞朕而归，欲留不可，偶成数语为赠，一以表君臣临别眷恋之私，二以为卿子孙后日之光旁耳。宝之。”诗曰：

不德作民王，贤良在朕旁。普天夫子铎，仙籍桂枝香。

昔日燕山宴，今朝浣水黄。雁行当不乱，衣锦好还乡。

黄氏后人即以此诗光耀其祖，并画5人遗像留传后世。至明代，大学士金镗于画像旁题词，曰“五桂传芳”。于是，梁弄就有了“五桂传芳”之美誉，后还建有“五桂传芳”石坊。待黄澄量建成“五桂楼”之后，聚书5万余卷，为学人提供方便，邑知名士诸开泉、胡芹、史梦蛟、吕迪辈交器重之。

“五桂楼”为三开间二层的五马结构楼房，坐南朝北。楼面通阔10.3米，通进深10.38米，明间面阔4.3米，次间面阔3米，通高9.96米。穿斗和抬梁相结合的梁架结构，屋顶呈“众”字形，利用中间暗阁来隔热防漏，有利于书籍的保管。阁楼暗间中至今保存有“柱百竿”一根，在长9.8米的竹竿上记注着当时建筑时的各种尺寸数据及梁架构件的符号，起到现在建筑图纸的作用。楼下为客厅，接待远近来访之学人。楼上收藏书籍，排列20余个高大的木质书橱，分藏所有古籍秘册。“举凡鹿洞谈经之作，龙门经世之文，漆园藏室之言，唐勒景差之制，以至九章算术，五垒兵图，星宫风角之渊微，王相握奇之阴奥，三乘秘藏，衍香象于元宗，九龠仙经，刊飞龟于丹帙，网罗略备，囊括无遗。”为了防火，在楼东西高筑封火山墙，更在书楼的四周筑有3米多高的围墙。大门开在围墙的东西两边，墙内楼前有半亩庭园，以鹅卵石铺地，庭内栽有桂树与柿树，近南墙垒石成桌以置盆景，朴质幽雅，正是“抗梁烟道，置桌星衢；反宇临风，层甍转

汉，鱼鳞比瓦，纳云气于重檐；雀日开窗，延山光于曲槛。柳条拂砌，低萦文宝之编；草色铺阶，近袭康成之带；霏尘不到，比谭易之鸡窗，秋隘无虞，殊校书之马队”。在此幽境之中，“试探宝轴，缓引金绳，攀枝叶于词林，酌波澜于学海；丛编栉比，秘册环周。如升悬圃之三成，琳琅满目；若陟明堂之九室，彝鼎生光”。四明山号称七十二峰，五桂楼独岿然耸峙，高出云霞之表，群峰四列，万点飞岚回带，故此，客厅中高悬着一块有书家吕迪所书的“七十二峰草堂”匾额。身临此楼，手执书卷，这对喜好读书的学人来说，真是何其悠哉乐哉！五桂楼“藏书之富甲越中”，闻名于东南，故有“浙东第二藏书楼”之称。

黄澄量五桂楼的藏书不仅专事收藏，他的藏书观念比较开放，打破了一般藏书家只藏不读之陋习，不仅自己“得一书，添一目，即读一书，而十而百而千而万，记于目者记于心，是亦博闻强识之一助也”，而且要求子孙登楼展视楹书，“以经训淑其德性，以史事扩其见闻，而又旁通诸子，泛览百家，以增长见识力”。黄澄量还利用五桂楼的藏书，手辑《明文类体》140卷，另著有《姚江书画传》《西明耆旧传》《四明记游钞》等著作，刻印后广为赠送。时至今日，五桂楼中还藏有部分木刻印版，可见当时五桂楼刻版印书的盛况。

黄澄量还有一套不同于宁波天一阁的藏书保管制度，尽力发挥藏书的实用价值。他将藏书向公众开放，欢迎学子前来借阅、查考。凡“海内好事，愿窥秘册者”，恣其阅览，且供食宿，但不出借。凡有文人学士前来查阅，悉供方便。因此，五桂楼虽地处山乡，但吸引了许多文人学士不辞路途劳顿，跋山涉水来到四明山西麓的梁弄查阅藏书，以一登五桂楼为快。黄澄量开放式的藏书思想，实质上已萌发了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初芽，可视为由私人藏书楼向公共图书馆转化的肇始，在藏书文化史上有着重大意义。

黄澄量曾订立规矩：

今世藏书之家唯宁波天一阁为最久，其制厨门楼钥子孙分房掌之，非

齐至不得开，禁以书下楼梯及私引亲友擅升，皆罚不与祭，故历久而书不零落。余既构楼三间以藏此书，益欲子姓守之，后世能读楹书，可登楼展视。或海内好事，愿窥秘册者听偕登焉。尝见世之谋子孙者，求田问舍，计非不周至，然数传之后不免窳贫，重念簞金之教，此余藏书之本意也。嘉庆辛未春仲石泉识。黄氏经籍，子孙是教，鬻与假人，即为不孝。石泉又识。（《姚江黄氏五桂楼藏书目·题识》清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五桂楼西侧原有书房2间，名曰“爱吾庐”，后扩建为5间，雕梁画栋，卷棚饰顶，建造讲究，名称“梦花书屋”，与五桂楼相互辉映，为黄澄量居室和会友、写书之所。东侧有平房五六间，为当时工匠雕版印书所用。另建有厨房和家人居室，周围圈以围墙，庭院有卵石砌面，形成一个古朴优雅的建筑群落、典型的江南书香门第。

嘉庆二十二年（1817），黄澄量邀请友人诸如绶为他整理藏书。诸如绶为其编写了《明文海总目》4卷。黄澄量对黄宗羲编成的《明文海》巨著极为珍视，乃仿其体制，利用五桂楼的丰富藏书，选录有明一代文集，辑成《今文类选》138册，为避文网，该书将王守仁、方孝孺、张居正等列名于前，而把有触清代忌讳的文章隐藏于后，编辑煞费苦心。《今文类选》为研究明清史及明代社会、经济、文学艺术、科技等提供了丰富史料，堪与《明文海》齐名。五桂楼还兼刻书籍，今尚藏有《思旧录》等部分木刻印版。

黄澄量去世后，由他的儿子黄肇震继承父志，继续收集书册，使五桂楼的藏书增至6万多卷，富甲越中，仅次于宁波天一阁，更使“浙东第二藏书楼”之称名实相副。清咸丰十一年（1861）社会动乱，太平军东进浙东，梁弄地处进军要道，五桂楼藏书部分散失。后有黄澄量孙子黄联鏢、曾孙黄安澜重新穷搜散失的书籍，又添买善本，历时5年，终于使五桂楼藏书基本恢复到原来的规模。黄安澜整理编成《姚江黄氏五桂楼书目》，计藏书1500多部6万余卷，3666种，仅史部地理类一项就有168部，将近4000卷。《姚江黄氏五桂楼书目》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付梓印行。

五桂楼藏书以清代刻本为基数，但其中亦颇多宋、元、明代善本。自光绪之后，由于战火频繁，五桂楼藏书有所散失。民国十九年（1930），明史研究专家黄云眉（号半坡）曾对五桂楼藏书做过一番整理，事后写有一份题为《清理黄氏五桂楼图书》的报告，从中可以明了此期间五桂楼书籍散失的详情。五桂楼藏书虽有散失，但大部分书籍收藏完整，是除天一阁之外浙东地区保存到近现代的第二座私人藏书楼。五桂楼藏书不仅在图书记文献史上有着较大的价值，对当前及日后的科学研究亦有着重大的史料价值。后人诗赞之曰：

不减琅琊福地居，四明山翠护图书。

夜深定作金丝响，劫火珍藏未烬余。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对五桂楼藏书重新编目，上报浙江省文管会。当时尚存图书18000余册。至1956年，由省文化局指令，将五桂楼藏书中的方志类全部及其他善本共6000余册，车运至杭州，由浙江省图书馆收藏。现在，五桂楼尚存古籍善本19部，625册；特藏书41部，878册；连普通书在内共计9997册。1982年，五桂楼被列为余姚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12月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朴的藏书楼虽然仍挺立在四明山麓。

汝湖农校

“结庐汝湖上，投竿汝湖下。万顷风月波，汝湖全属我。”这是明代提学副使冯兰隐居雪湖山时对汝湖的吟咏。诗中的湖光山色，曾经是何其美旷！泗门这座古镇曾倚湖而灵，以湖为魂。如今汝湖虽已半顷无存，但仍有许多与汝湖有关的旧事故物留存在这座古镇记忆的痕迹里。在百年之前的汝湖之畔，曾创立过一所以湖为名的学校，它就是首开姚邑农务学堂之先河的“汝湖农校”。

光绪二十九年（1903）岁末，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以立法的形式鼓励地方提倡新学，开设学堂，以图开通民智，富邦强国。时姚邑之地，学堂寥寥，全县更无农务专科学堂之创设。光绪三十三年，泗门人谢宝书慨乡邑农业之不振，倡议在乡募股兴办农学，得到了姚邑乡绅的支持，不久即募得善款13040银圆。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在泗门南谢设校开学，取名为“汝湖农校”，谢宝书任首任校长（谢宝书字培卿，明代大学士谢迁的十三世孙，光绪举人，拣选知县、主事衔）。谢宝书不但学问渊博，而且极富远见卓识，他创建“汝湖农校”后，即委派年轻教员留学于“日本大阪农业学校”，学成后回校效劳。学校先设蚕科，后设农利，并提倡勤谨笃实的学风，不久即声名鹊起，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民国元年（1912），经县议会议决，“汝湖农校”改称为“余姚县立乙种农业学校”。蔡元培先生在所撰《余姚汝湖乙种农学校记》一文中称赞该校“足诚吾所望于全国同胞者矣！”

1927年，因北伐战争爆发，浙江政局不稳，学农之士难寻用武之地，“余姚县立乙种农业学校”终因生源匮乏、经费难以维持而关闭，学校改建为“余姚县第二完全小学”，1949年后改名为“汝湖小学”。20世纪80年代初，“汝湖小学”改建成“泗门镇中学”。“汝湖农校”的礼堂在1985年被拆除，后来学校搬迁，整个学校成为一座小型工厂。有一通余姚

县知事陈国材所撰《余姚县立乙种农业学校记》石碑尚存。

《余姚六仓志》记载：“汝湖农校”有石碑二通，其一为余姚知事陈国材所撰《余姚县立乙种农业学校记》石碑，另一为教育总长蔡元培所撰《余姚汝湖乙种农学校记》石碑，均系民国二年时所镌刻。如今“陈碑”尚在，“蔡碑”却已不知去向。据悉数年前，一位旅美的农校校友曾特意回乡访校寻碑，但世事变迁，物去人非，老人禁不住黯然泪下，只在故地留下一影后憾然离去。

“汝湖农校”后面原有静静的河流，河上还有一条狭长的石桥，如今都已无处可寻。农校附近，即是明代第十堡诸氏望族的世居之地，这里曾有闻名浙东的“昌古斋”藏书楼；农校东隅，是首任校长谢宝书所构建的“永思居”，谢校长沐灯苦辑《姚江诗录》之背影，似乎还在前夜。

姚江中学的抗战洗礼

在抗战时期，有70余万人口的余姚，只有两所设备极简陋的初级中学。一所是位处酱园街的私立实获初中；一所是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和姚江中学合并的学校，民间仍称“姚江中学”。“姚江中学”全称“余姚姚江战时中学生补习学校”。民国二十八年（1939），因考虑到日寇侵略，战情非常，为使余姚中学生不因战争而废弃学业，特于是年建立“姚江中学”，校址选在龙泉山三孝祠。民国三十年一月，将姚江中学和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合并，由县长蔡竹屏兼任校长。四月，日寇侵扰浙东，铁蹄先后蹂躏绍兴、宁波。

余姚地处宁绍中间，开始经受战火洗礼，警报随时在姚城上空响起，敌机对姚城扫射与轰炸的火光，先在姚城东门外轮埠码头揭开序幕。县政府所属各机关都已撤退，县政府为避免目标，即由北城迁往南城外最良桥边的孤儿院里，进行着最后的抵抗。身为县长又兼任校长的蔡竹屏，当然得考虑姚江中学学生。为保护这些年轻生命，县长决定带这所学校的学生一同逃难，让学生们成长为他日复仇的前驱。姚江中学迁避第一站就在最良桥旁的孤儿院里，和县政府在一起，在紧张的氛围中，拥挤在临时教室里，上着“最后一课”。孤儿院里没有防空壕，每当敌机来临，学生们就蹲卧在院内的一座大古坟旁边或近侧的嫩绿大豆田里。有时从早到晚一天要躲避好多次。

一天午后，刚经过剧烈轰炸之后，又来了一架敌机，盘旋一会儿后，就在最良桥南首投下两颗炸弹。隐蔽的学生们静待炸弹爆炸，然而奇怪的是，炸弹下来十几秒钟之后，只发出不甚剧烈的啪啪两响，难道是炸弹尚未爆炸？老师要学生们再屏息等待一刻。几分钟过去了，飞机已飞远，人声开始嘈杂起来，学生们先后聚拢过来，这才发现两颗炸弹确是爆裂了的，但这两颗炸弹是用马粪纸做成、铁皮箍紧的纸弹。爆裂之后散飞出来

的不是铁片，而是印刷得相当精致的伪农民银行的假钞票。开始时，不少农民见是钞票就去争抢，等看到钞票背面印着诱惑群众不要抵抗、投降献城的“来归证”，所有的人便对钞票大吐唾沫，有人当场将钞票撕成了碎片，有人还将它烧掉了。由此可见，余姚人民对日寇的痛恨程度，以及对良知之心的坚持。

到4月21日，余姚沦陷的前两天，城里的国民党驻军撤退了，县国民政府也要退向四明山，县长蔡竹屏决定把姚江中学随政府迁移，由李斐老师带领撤向四明山。

临撤走之前，县长蔡竹屏曾对学生有一场讲话，他在《流亡三年记》一书中是这样记述的：“薄薄的初夏朝云掩住了阳光，孤儿院的院子里排列着肩背包囊书籍的几百个男女孩子，听我讲话。他们的脸上杂着愤怒忧郁的情绪，开始读到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课程。‘孩子们，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今天我把你们送到大岚山，送到我们复仇的游击根据地。记住！今天起，你们是没有了家乡，没有了田地，没有了祖宗坟墓的流亡人了！丢了你们的爹娘，丢了可爱的龙山舜水，丢了你们最亲爱的两所学校，踏上复仇的征途！记住！记住今天耻辱的日子，今天是民国三十年四月二十一日……’我狂吼着，我几夜未眠的干枯喉咙，已经嘶哑了！热泪在我脸上流下来，热泪也从青年们的眼里流着，挂到颊上，挂到嘴角。原来注视我的几百双眼睛，都垂了下去……‘不要挂念我！我为存中国官吏的正气，我必守土到最后一分钟，我们也许不能……’孩子们都哭起来了！我的眼睛模糊了！泪从口里咽到肚里。在室内倾听着的一位先生，竟失声痛哭起来。我无法结束我的讲话，我不敢再看这批男女青年，我用惯常的热情泛滥时强自镇持的方法，我抬头向天，把眼光投向远方。孤儿院里临时校舍里的学生们上山去了，院子里立刻像死一般沉寂。”大家读一读抗战时期余姚县流亡县长蔡竹屏的这一段文字，必然会产生强烈的感触。

两天之后，即余姚人民永远不可忘记的一天——1941年4月23日，县城沦陷了。驻守在龙泉山麓、姚江边上的国民政府最后一队守军，在尚未看

到日军的情况下，就盲目地放了一排枪，逃走了。

姚江中学随县政府先迁至梁弄横坎头，上了几天课。随着日军侵略的深入，又随县政府南迁，翻越羊额岭，经丁家畈，因县政府驻陈家岩，姚江中学来到陈家岩西侧的后朱村继续上课。日寇先后多次对四明山进行残酷“扫荡”，是年端午节，日伪军分兵四路“扫荡”到大岚，宁波市区几所随宁波市国民政府撤入四明山的学校不得不先后解散，姚江中学仍隐蔽到黄家庄继续上课，还收容了小部分由宁波撤来的学生共同上课。一年之后，战争越来越残酷，物质越来越匮乏，日寇的“扫荡”越来越紧，为了保护学生，不使学生死在日寇刀枪之下，只好将姚江中学解散，派人护送所有学生回家，直到将学生送交给学生父母手中为止。

抗战胜利后，民国三十五年（1946）4月，姚江中学于酱园街原实获中学旧址办学，9月招生，10月正式开学上课。1950年1月，姚江中学停办，学生并入余姚县立中学。

余姚第一中学

余姚中学创办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为国育才，造福桑梓，成绩斐然，可以说是余姚现代、当代培育人才的摇篮。

民国二十四年夏秋之交，在上海沪江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的朱荣泉和留学德国在光华大学执教的朱公谨，联名倡议在余姚城内设立一所初级中学，取名“实获”，旨在教育学生获得实用的知识，具备诚实的品德和老老实实的处世态度。同时，邀集热心教育人士成立学校董事会，筹集开办经费，聘请朱长春（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为校长，择定余姚酱园街六浦庙北首的同善堂、吕祖阁等庙堂为校舍。是年9月初，延聘专职教员5人，招收初中新生一班，于中旬正式开学上课。学校开设公民、国文、英语、算学、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动物、植物、历史、地理、劳作、图画、音乐、体育及童子军等课程。时值抗日战争，学校对所有课程力求充实抗战内容，使青年读书不忘救国。语文课尽量选授抗战论著及文艺作品；史地课尽量阐明历代斗争之意义，并添授现代抗战之地理；课外活动尽力施以各种有利于抗战运动的基本训练，如爬山、消防、救亡宣传等。由于受抗日战争影响，求读于外地的学生返回余姚，纷纷要求在实获插班借读，一时全校学生激增至220人，班级扩充至6个班。当时，余姚及邻县的旅外文化教育界人士陆续回乡，应聘来校执教，如朱荣泉、黄云眉、杜天縻、王幼于、韩文藻等。他们治学严谨，各有专长，教学认真，相互配合，形成良好的教风和学风。抗日自卫队政工室主任郭静唐也曾在实获中学兼教国文，在学生中传播进步思想，鼓舞学生抗日救国。

民国二十七年（1938）夏，实获中学首届21名学生毕业。这是余姚的第一批初中毕业生。此后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秋，已有8个班级，学生达到450人，专任教师增加到23人。学校成立“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参加抗日救国的社会活动。民国三十年（1941），日寇

入侵宁绍地区，4月19日登陆镇海，镇海、宁波相继沦陷。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处钱江南岸左地指挥部命令该校必须随同县军政机关撤至姚南山区岩头村。学校师生于21日开始南迁，经梁弄镇、翻夏家岭，跋山涉水，草行露宿，至23日到路坑村。是日，余姚县城陷于日军。姚南山区本来生活贫困，粮食紧缺，学校困难至极，而师生仍坚持教学。至6月初，粮食殆尽，无法再维持下去，只好将学生遣散回家，学校宣告停办。

民国三十年（1941）4月23日余姚沦陷后，日伪成立余姚地方维持会。8月，在原实获中学校址创设私立舜水初级中学，学生均为实获中学肄业生，设初中3个班级，第二学期增加到6个班级。10月，维持会改组为余姚县乡镇联合自治会，下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4科。崔善工任教育科长，兼任舜水初级中学校长。次年3月，改由王士烈主持校务。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1月，余姚县乡镇联合自治会改组为汪伪县政府，学校亦随之改名为余姚县立初级中学。不久，学校增设高中一班，更名为余姚县立中学。翌年春，于武胜门西原“县立苗圃”营建新校舍，次年10月竣工，11月，学校迁入新址。

民国三十四年（1945）8月，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余姚县政府自天台县回归姚城，即委任周绍基为余姚县县立中学校长，并请来一批学有所长、认真教学的教师任教，教学秩序正常，学生学业长进。学校成立歌咏团、音乐队等，经常举行国语演讲、作文比赛、英语背诵、书画展览、班级友谊会等活动，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此外，还经常请学者、名人来校讲演。民国三十七年（1948）11月1日，学校将向日伪接收之日定为建校日期，举行“建校3周年紀念会”，举办教育成果及书画展览。后刊印《校庆紀念册》，分赠各界人士。

民国三十七年（1948）冬，解放战争节节胜利，部分学生创立《芳杜》周刊。中共余姚城内地下联络站多次向学校施加影响，要求学校坚持上课，做好护校工作，以迎接余姚解放。民国三十八年（1949）4月28日晚上，周绍基主持召开校政常委会，决定组织护校委员会，以保护学校财产

和师生安全。5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66师先头部队入城，次日，余姚宣告解放，成立余姚市军事管制委员会。6月9日，余姚市军管会文教处副处长李月亭率领全处人员到余姚县立中学办理接管手续。市军管会副主任薛驹亲临接管，并任命吕公羽为县立中学军事代表，陈均铨为代理校长，宣布废除教导处。

1949年秋，浙江省第二专员公署（宁波专署）任杜天縻、陈均铨等7人及以学生代表2人为校务委员会委员，杜天縻为主任委员，陈均铨为副主任委员。1950年，专署调派郑康范任教导主任（兼任校务委员）。1950年2月，共青团余姚县团委在学校发展12名青年团员。3月7日，建立余姚县立中学第一个团支部，林人聪任书记。5月，余姚县立中学学生会成立，中共余姚县委书记陈安羽到会讲话。9月，奉命将高年级春季三班并入省立宁波中学，高年级秋季二班并入宁波市立中学。1952年秋季起恢复高中招生。1953年下半年，宣布县长郭子栋兼任余姚县立中学校长，任命王世瑄为副校长。1954年改名为余姚中学，并接收春晖中学高中二年级一个班，学生43人。增设最良桥分部。全校班级最多时达到31班，学生1687人。

1955年4月，建立中共余姚中学支部，侯润生任支部书记。同年5月，章亦平担任副校长。1955年7月，改名为浙江省余姚第一中学。1958年5月，宁波专署任命张肇良为余姚第一中学第一副校长，次年改任校长兼中共余姚第一中学支部书记。学校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开展“教育大革命”，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生产劳动教育。1960届高三学生参加“宁波、嘉兴两专区联合统考”，取得第一名。

1960年春，余姚第一中学被确定为宁波专区重点中学。1961年，中共余姚县委为贯彻“八字”方针，集中力量提高教育质量，指示县文教局将余姚三中（丈亭）、四中（横河）、七中（马渚）的高三学生，以及余姚二中（陆埠）的高二学生并入余姚第一中学。当年，省教育厅确定余姚第一中学为省24所新学制试点学校之一。

余姚试院与秀才考试

县衙东南即为试院，鼓楼之北，即是科举制度施行时代每年县试的场所，称作试院，亦即所谓考秀才的地方，民间称之为考棚。试院的建筑较迟后，在清同治年间之前，凡遇县试，即暂以县署做试场。至同治十一年（1872），由邑人朱久香等禀请知县陶云升，获得允准，遂于县署东南侧，城隍庙的西南侧，划地创建，建号舍四进，共六十间。另有土地堂一间，阅卷房四间，厨房二间，头门三间，有甬道、龙门、角门。正厅曰达善堂，取由此以选者人志于达则兼善天下之意。试院东临县东街，有巡防署、城守署。

自古以来，民间一直把有学问的人称为秀才，从隋唐时期创设科举制度开始，一直到清代末年的1300余年间，中国人特别重视秀才的考试。

科举考试分大三考、小三考。大三考的程序是：第一级为考秀才，叫作小考，以县为单位，考中了就是廪生，俗称秀才；第二级是考举人，叫乡试，是以省为单位，考中了就是举人；第三级是考进士，是汇集全国举人的考试，经会试、殿试，中试者为进士。按科举考试的正途出身而言，当然以进士为本位，以科举制度而言，是以秀才为起点。过去的读书人，要想获得成果，必须经过考试。虽然一生读书至老，但未经过考试的读书人只能称作“白丁”；经过考试，但不及格，也就是没有考中秀才的人称为“童生”。即使考到七八十岁还是不及格，仍是童生，那就成了“老童生”。

古代称学校为庠序，秀才经过科考合格后可以入府学、州学、县学再读书，成了县学的学生，所以秀才的真正名称是“庠生”。各县的秀才有固定名额，有定额谓之员，《唐书·儒学传》云，国学置生七十二员，太学百四十员，四门学百三十员。郡县分三等，上等学置生六十员，中下以十为差，县学置生四十员，中下亦以十员为差。故此秀才又称“生员”。明清时代“生员”享受朝廷（府、州、县）按时发给银两补助生活，故又

称“廪膳生员”，简称为“廪生”。余姚历来属上等大县，亦称一等县、繁县，定秀才名额为四十名，自明代嘉靖之后，因为有了先贤王阳明，特予增加秀才名额十名，所以余姚每次考试即可录取五十名秀才。

秀才的考试亦分先后三级，称作小三考，又名岁考，亦名科试。

一为县试，考五场，全县的白丁和童生都可应考。县试之前，先在学宫教官处报名，还得自己找一名相熟的廪生作保。如果找不到作保的廪生，就不能参加考试。报名之后，由教官再派一名廪生作副保，无此人亦不能参加考试。考试时由知县为主持人，可是知县绝对不看卷子，以防犯弊病。考试的规矩，四场都是“四书”题的八股文，第五场考古赋或古诗，此考名叫考古，亦叫古场。第一场榜上未取者，不得考第二场，以后每场都要删人，如与试者共有100人，则末场所剩不过三四十人了。末一场的第一名叫“首卷”，这是必然会中秀才的。

二为府试，知府为主考，亦考五场，考试情况与县考略同。考时所属各县的考生都去府城应考。余姚县历来归属绍兴府，就到绍兴府城参加府考。

三是院试，由负责全省教育事务的按察副使任主考，名叫学政，亦叫学差，也可称学院。院考也在府城举行，斟酌各县的人数分批考试，每次总是三县或四县。院试得中后才真正算廪生（秀才），所有考不中的都叫作童生。进了廪生以后，还有一场复试，以示郑重。前两级考试，没什么大关系。比如县考，第一场没有考中，则第二场便不许再考了，可是等到府试时，依然可以参加考试；府试第一场没有考上，到院考时依然可以参加，而且即使只考过县考一场，因为已经名人科考名册，也就算是童生了。县、府、院三考都是第一名者，通称“小三元”。

科考的地方文雅一点叫贡院，一般称试院，民间俗称考棚，它的体制，现在只有南京夫子庙内保存得最为完整，从中可以知道大概。余姚的考棚正门开在舜江楼后面稍偏东的位置，正门外的东西两侧有东西两辕门，以便维持秩序。正门叫作龙门，门内是大院，考生都在这里等待点

名。北首有3间厅堂，中间为过堂，考官坐在西间，面朝东点名。点到某乡时，即有该乡保甲长之类趋前站到考官身后。所有作保的廪生，也都立在考官的身后，然后对考生点名。点到某考生的名字时，得答应“有”，走到考官案前，大声地说“某人保”，作保的廪生也跟着说“某人保”，这才可以领取考卷进场。这个名词叫作“唱保”。如果某考生没有唱保，便不得领卷进场。

点名簿上每个考生名字下面还注明身材高矮，面色黑白，有须无须。考官在点名时审看本人与所注之字是否相合，若看着不像本人，就有冒名顶替之嫌，即把该考生扣留、查审。一旦查出确是枪手冒名顶替，那就严格处罚，永远取消考生的考试资格。在点名厅的后面有搜查人，叫作“搜子”，对每名考生全身搜检，如果在上身搜出挟带的“四书”，即予以没收，但还可以放入考场参加考试。倘若是在下身搜出“四书”，便有亵渎圣贤之罪，即不许入场，罚在场外跪地一天。

进去之后即是考场，最北5间正屋是“至公堂”，是考官阅卷的地方；东西两边各有几排无门的敞棚，每一排分隔成10余间考座，每间的外面贴有字号。每间考座面积约2平方米，进口处拦腰横着一条可以摇动的宽木板，进棚后放平木板当作考桌；里面有一条木凳，座角有一瓦质尿盆，供考生小便。规定不许大便，倘非大便不可，须先把卷子交到堂上，就放你上厕所，回来后再领回卷子。但这卷子的背面已盖上一颗黑色图章，叫作“屎戳子”，即使你做完这份卷子，考官也不再批阅这份卷子，你也绝无进秀才的希望了。考生如果腹泻内急，难以忍耐，为了不丢掉中秀才的机会，就只好拉在裤子里。

无论县、府、院都是封门考试，在发出考题之前，先把大门封严，不许出入。每场考试到太阳落山便得交卷，不许点灯，这个名词叫作“不继烛”。有完卷早的，每等够10个人，就开门放出一批，这叫作“放排”；放出再关门，再有交卷者亦等够10人再放一排，共放3排。门口备有吹鼓手，前3排放出门时，都要吹吹打打欢送。以后便不再开门，俟天将黑才开

最后一次门，就不再关了，晚交卷的考生可以随时出门。其中有不能完卷，或偷着点蜡烛的，那么该卷收起之后便捆起来，不予批看了，也就是说你延迟交卷而不再录取了。

各县按规定名额录取秀才，看来好像很公平，实际很不公平。有文风低下的县份，应考竞争者少，录取的可能性就大；余姚文风特盛，竞争激烈，录取的机会就少，做余姚县的秀才难度就大了。考中秀才者即可入县学读书，享受朝廷的补贴，称为“廪膳生”，简称“廪生”。“廪生”学习优良，即可被推荐到国子监深造，叫作“贡生”。到了国子监读书的人，叫作“监生”。

余姚最末一届（光绪二十九年）科试有著名秀才两人：蒋梦麟和陈正言。蒋梦麟后来做了近20年的北京大学校长；陈正言是原余姚文联主席胡丁的父亲，为人正气，是个极有学问的秀才先生。

考中秀才还是比较荣耀的事，众人见了秀才都得称“先生”。且有许多民间事情必须用到秀才：结婚迎亲时男方必须请两名秀才做伴郎，女方所请陪伴新郎的人也必须是秀才。如遇丧事时，司礼也必用秀才。事后的婚丧宴请，秀才的席面比普通客席要丰盛得多。秀才平日有事即可以见知县老爷，平民百姓是绝对不可以的。每当知县下乡办公事时，陪知县的人必须是秀才才有资格。若是犯了案子见官，平民百姓必须下跪，秀才可以站着说话。过去打官司挨板子是最为平常的事，秀才犯事却不能打板子，即使有所责罚，知县也不能动刑，必须交由学官的教官去责罚处理。而教官也不许对秀才打板子，只可往手心里打几下戒尺。民间有一句“改换门庭”的说法，普通百姓家的门框高度是2.3米，秀才家的门框高度是2.43米，比平常人家高0.1米。最为重要的是中了秀才之后，他家的地丁赋税可以减免，还免除自身的终身徭役。秀才去世时，他的神主牌位上可以写上“庠生某某人之位”，这是古代人极为看重的。

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叶秉钧、史翊经等人发起，在试院东北角新建了十五间房屋，分作莹竹斋（前斋）、济朴斋（中斋）、仪菁斋（后

斋)三斋作为校舍,将天井隙地辟为校园,创建了一所新式小学,因试院内原有一座“达善堂”,即以此为名,称为“达善学堂”,由叶秉钧担任校长。到光绪三十年科举制度废除,不再在此考试秀才了,就利用试院扩充校舍,改校名为“余姚县高等学堂”。由朱九畴、史凤喈、张德海先后出任校长。宣统初年,改称“余姚县立高等小学校”。民国初年,校舍已不敷需用,遂将试院外的“典史署”划归学校使用,扩充校舍,辟为分部(称后校)。民国七年(1918),余姚县政府将原“典史署”拨给教育局,分部并入总校。民国十六年2月,并入余姚县立女子完全小学和余姚县立高级小学校城区区立第一初级小学,改组为余姚县立第一完全小学校,有教员15人。8月,改称余姚县第一小学校。到民国二十四年,根据部颁《小学教育规程》规定,县以下公立小学以校址所在地之名为校名,县一小地处府前路,遂改名为余姚县立府前路小学校。民国二十八年(1939)8月,日机投弹炸毁达善堂校舍。新学期为避免敌机空袭,学校曾先后疏散到接待寺、南河头、落马园吕家祠堂及郑巷等地。民国三十年4月23日,姚城沦陷,学校暂停,是年秋复课。抗战胜利后,更名为北城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民国三十六年(1947),改名为余姚县阳明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

学堂初创时,科举制尚存,旧势力反对新学,学生入学仅数十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朝廷下诏废除科举,学生入学骤增,旋即新办的初等小学堂并入本校,规模一般为4~6学级,学生200人左右。宣统三年(1911),毕业学生春秋两季达60人。民国十六年,有8个学级学生393人,寄宿生96人,分15个寝室。其后,规模逐年扩大。民国二十五年,9个学级,学生577人,寄宿生86人,14个寝室。此后4年,规模一般为9学级,500余人。至1949年前,府前路小学为余姚县规模最大的小学。

1949年5月23日,余姚解放。学校由余姚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处于6月接管。遵照军管会“反动者革除,一般不动,逐渐改造”的方针,校名仍称余姚县阳明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校址不变。时规模13个班级,学生

908人。9月5日开学,到校注册的仅106人,后通过家访、家长会,改晚上上课,仍只有122人。以后增加到196人,编5个班级,教师8人,剩余11人参加征粮、集训。1950年春,第一中心学校与简师附小合并,迁至酱园街子孙庵、六浦庙、药王殿(原简师校址),改校名为阳明区第一小学。

几年后,县署内建筑予以改建,将原试院的北部改建为人民大会堂,南部改建为县第一招待所。1995年,秘图山地块改造时,人民大会堂和第一招待所被拆除,改建成现在秘图山路的商住楼。

姚江科举三鼎甲

科举制度自隋唐时期开始创设，一直延续到清代末年，前后长达1300余年。中国读书人特别重视科举考试，促使读书人在进入官场之前全力饱读经史、磨砺文才、关注现实；又为完善仕途，为官场的自我更新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人才资源；更保证了进入官员队伍的士人能够随着时代变迁和自身地位的变化而不断适应现实的需要，成长为符合治国需要的合格人才。

科举考试是封建时代读书人唯一的进身入仕之途，每3年一考的进士考试，录取名额的多少标志着该地区的荣誉，代表着一个地区的文化层次。余姚人经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名列各县之前茅，为全国之翘楚。

经查原学宫所竖藏《余姚县进士题名碑记》载，余姚读书人经由秀才、举人，考中进士的人数，唐代以前因资料不全，难以统计，自唐代至清末，共有635人，其中唐代3人，南宋134人，元代7人，明代390人，清代101人。另有武进士明代44人、清代19人，共63人。

进士考试分两次：会试、殿试。首先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会试，每3年一考，春天举行，故称春闱，取中者称贡士，五经魁首称会魁，第一名称会元。有贡士资格者，再经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后，改称进士。进士分三甲，一甲称进士及第，共3名，即状元、榜眼、探花，即“三鼎甲”；二甲称进士出身，人数不限；三甲称同进士出身，人数不限。

余姚人经过殿试考中一甲第一名状元的有5人：莫子纯，宋庆元二年（1196）考中会试第一名会元，是届诏免廷试，准礼部名次以莫子纯为一甲第一名（状元）。后因莫子纯已经担任官职，退充第二（榜眼），另换邹应龙为状元。宋景定三年（1262）余姚梁弄人方山京，明成化十一年（1475）余姚泗门人谢迁，成化十七年（1481）余姚城里人王华，嘉靖十

四年（1535）余姚菁江渡人韩应龙。尤其是嘉靖十四年乙未科，全国共录取进士325名，余姚县考取17人，占全国的5.2%。17人中更有头名状元、第二名榜眼（孙陞）、会魁（会试第三名诸燮），同为余姚人所得，一时名扬天下（明代共有状元89名，浙江省得20名，余姚得3名）。

余姚人经过殿试获得一甲第二名榜眼的共6人：宋代的莫子纯（庆元二年），明代的黄珣（成化十七年）、孙陞（嘉靖十四年）、毛惇元（嘉靖三十八年），清代的诸重光（乾隆二十五年）、邵瑛（乾隆四十九年）。

余姚人经过殿试获得一甲第三名探花的共4人：明代的谢丕（弘治十八年）、胡正蒙（嘉靖二十六年），清代的卢文韶（乾隆十七年）、朱兰（道光九年）。

上述即是余姚进士中的“三鼎甲”。

全国会试时获得第一名会元、五经魁首（会魁）的余姚人共17人：宋代莫子纯（庆元二年会元）、赵善誉（乾道五年会元），2人；明代陈清（成化二年会魁）、华福（成化二十年会魁）、邹轩（弘治九年会魁）、王守仁（弘治十二年会魁）、黄堂（弘治十五年会魁）、谢丕（弘治十八年会魁）、陈垲（嘉靖十一年会魁）、诸燮（嘉靖十四年会魁）、陈陞（嘉靖二十年会魁）、胡正蒙（嘉靖二十六年会元）、孙鑛（万历二年会元）、诸大圭（万历五年会元）12人；清代邵吴远（康熙三年会魁）、卢琦（康熙六年会魁）、邵晋涵（乾隆三十六年会元）3人。

另外再说一下省级考试的乡试，每3年一次于秋天举行，称秋闱，合格者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余姚人在乡试中获得第一名解元的共21人：明代有黄珣、谢迁、孙昇、胡铎、孙清、谢丕、孙继先、张怀、诸大奎、孙思述、姜镜、张绍魁、毛凤起、宋宾王14人，清代有徐景范、邵奏平、谢宜相、邵大业、岑兆松、翁元圻、陈锦7人。

省级乡试中获得经魁的余姚人，明代有51人，清代有11人，共62人；在清代另有诸嘉乐、汪墉2人获得亚魁。

文科考试之外，还有武科考试，但明代之前不设武状元，只设武会元。余姚人经过武科考试，明代有孙堪获得武会元；到清代，有孙琮夏获得武状元，谢文获得武会元。获得武解元的，明代有周书、徐世卿、丁世美、徐邦达4人，清代有戚师塘、胡九如、吴大勇、张景违4人，共8人。考得武科三中式的，有明代的潘栻、徐锐、钱如山、胡宗京4人。

另需说明的是：为尊重历史，上述统计只计该历史人物在世时归属余姚县的，在世时归属慈溪县的不计在内。

明清科举以“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取士。乡试时，每经各取一名为首，名为经魁。会试时，每经的首名称会魁。每科乡试、会试，各有5名经魁、会魁。经魁中的第一名称解元，会魁中的第一名称会元。

余姚五状元

经殿试而高举一甲第一名（状元）：

余姚的第一位状元是南宋庆元二年（1196）丙辰科的莫子纯。莫子纯（1159—1215），字粹中，余姚城东南隅待士坊（现南城学弄至东朝街）莫家弄人。莫子纯自小随仲父莫叔光生活。莫叔光累官至吏部尚书兼秘书监，敢于犯颜直谏，持论严正，往往为朝廷所采纳、施行。莫子纯以仲父莫叔光恩补官铨试，后又待试江东运司，俱获第一名。庆元二年赴礼部会试，又得榜首，诏免廷试，即以莫子纯为第一名状元。后来莫子纯因已担任官职，退充第二（榜眼），状元让给了邹应龙。当时，即在余姚学宫之后的桃李园前建竖莫子纯的状元牌坊，不知毁于何时。莫子纯任签书平江军节度判官厅公事，累官至中书舍人。为官清正，立朝有节，受到朝外舆论的赞扬。由于得罪权臣韩侂胄，被排挤出京，调任温州知州，又降为江州太平兴国官提举，后卒于任所，年57岁。

余姚的第二位状元是南宋景定三年（1262）壬戌科的方山京。方山京，字子高，出生于余姚县四明乡（梁弄）姚巷。父方达材曾就读于梁弄

怡思书院，学成之后，成为梁弄姚巷孙氏私塾教师，并入赘为婿，因以为家。晚年得子，生下方山京。方山京幼年丧父，但他甘于清贫，遍读群书，力学不辍。考秀才，中举人，再赴京应试，登上甲科第一名（状元）。任平江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景定五年，方山京担任主考官，出试题极言：国库贮藏有侵吞之隐私，公田发生被权贵侵扰之行为，指摘朝廷缺失，胆壮言正，为士林所誉。但遭到权贵的弹劾，只好引退归家，杜门教子。度宗即位，起复方山京，任秘书省正字。由于方山京为官严正，胆壮敢言，不久又遭到权贵的排挤，担任管理仙都观的闲职。由于多次遭到权贵的打击，含怨入心而致病，方山京不久即病逝于仙都观。在方山京故居梁弄姚巷村口，曾建有“状元坊”，石柱木面，毁于20世纪60年代。方山京曾出资在姚西长冷江上建桥，称“方桥”。

余姚的第三位状元是明成化十一年（1475）乙未科的谢迁。谢迁（1449—1531），字于乔，号木斋，泗门人。年轻时，曾去江苏毗陵某姓人家做私塾教师，以束脩弥补家用。成化十年秋，举乡试第一（解元），第二年中乙未科会试第三名，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迁东宫讲官。在余姚第四门建有谢迁的状元坊。弘治元年（1488）春，谢迁升为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日讲官，每日给年轻的皇帝讲课，成了皇帝的老师。弘治八年入阁参与机务，十一年晋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弘治十六年二月，特晋谢迁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谢迁秉节直亮，明敏严正，有贤相之称。孝宗临终，受顾命辅佐武宗。武宗嗣位，太监刘瑾专权，政事大坏。谢迁对武宗皇帝多次规谏，但未被接受。面对刘瑾阉党专权乱政，谢迁不得已而致仕。归家后，招集俊异之士，以及同里诸理斋、冯兰、吕本父子等共研学问，诗酒唱和。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病死。世宗皇帝即遣使者来泗门慰问谢迁“万安”，嘉靖六年（1527），大学士费宏去职，举谢迁以代。谢迁时年79岁，进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赴任数月，以年老体衰为由，力求去

职，遂于嘉靖七年三月致仕还家。嘉靖十年二月，病逝于家中，年83岁。追赠太傅，赠谥文正。

余姚的第四位状元是明成化十七年（1481）辛丑科的王华。王华（1446—1522），字德辉，号海日翁、龙山公，是心学大师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曾寄居龙泉寺中读书，至深夜，喜好恶作剧的寺僧常扮作鬼怪，爬到屋上掀瓦抛砖，大声呼叫，对王华进行恐吓。但王华仍是正襟危坐，神气自若，诵书不止。成化十六年秋，王华中举（经科魁首），第二年春，考中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在余姚北城瑞云楼东南建有状元坊，该坊西侧30多米处建有王阳明的会魁坊，父子两牌坊毁于20世纪50年代。王华曾任少詹事兼侍讲学士。正德初年，权阉刘瑾专横乱政，儿子王阳明因触犯权阉刘瑾，被贬官贵州龙场驿驿丞。王华因此受到牵连，被调离京城任南京吏部尚书，不久又被借故罢免归家。正德五年（1510）八月，刘瑾因谋反获诛，王华才得以官复原职，致仕家居。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因儿子王阳明功成名就，受封“新建伯”，同时追赠父亲王华、祖父王伦为“新建伯”。嘉靖元年（1522）二月，王华病死，年77岁。在瑞云楼附近原建有王华状元牌坊，毁于20世纪70年代。

余姚的第五位状元是明嘉靖十四年（1535）乙未科的韩应龙。韩应龙（1498—1536），字汝化，号五云，祖居姚西菁江渡，出生于余姚南城玉兰堂，幼年时即与双胞胎弟弟应奎同入县学攻读。韩应龙家道贫困，课余时间，即上山打柴补助资用。经过多年的刻苦攻读，到了明嘉靖十二年中举。嘉靖十四年春，韩应龙赴京会试，一举中榜。在殿试时，明世宗以《法天法祖》为题，韩应龙对答很称世宗旨意，被录取为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授为翰林院撰修，又被召侍经筵备顾问。嘉靖乙未科，全国共录取320余人，仅余姚人考中进士的竟然多达17人，而且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孙陞）、经魁魁首（会魁诸燮）同为余姚人所得，为历朝所罕见。可惜韩应龙为官仅一年余时间，到第二年某日黎明，韩应龙凌晨起

床，盥洗毕，冠带执笏准备上朝，忽然感到身体不适，即端坐在椅，稍做休息，谁知溘然去世，年39岁，可谓英年早逝。原老西门内关帝庙大门前，建有韩应龙状元坊，经历了400余年。抗战初期拆除余姚县城墙时，连带被拆除。

科举征辟和魁首名录

科举之制兴，所重者在进士。余姚为浙东重镇，人物科第甲天下。原余姚县学宫有进士题名碑，毁于20世纪60年代。其中收录进士共635人，因唐代及唐代之前资料残缺，名录有所遗漏。

余姚人科举录取之外，因学问渊博、名震朝野被皇帝获知，下诏特征，或被举荐征用的，自汉代严子陵始至清代，共达187人。其中仅明代就多达108人次，其中有赵谦和岑琬两人被特征两次。

特征名录

汉：严光；**吴：**虞翻；**晋：**虞喜、虞潭、虞预、陈虞寄；**宋：**顾临、高翥（累征不起）、赵师龙、莫叔光、孙嵘叟、岑贤孙。（12人）

元：徐仲达、燕宗允、黄义贞、罗大临、王文衡、魏贵龙、李世昌、杨国贤、王希贤、高荣龙、孙原彝、吴复卿、唐与贤、岑贤孙、史其希、魏恺、徐彦威、杨国用、李昊、李自强、魏政、岑伯玉、张溥、岑可久、吴守中、史溥、汪斌、吴镛、王嘉闾、魏铭、汪性、史河、方伯、胡秉常、史锐、闻人焕、史应炎、史镛、史世忠、史镐、胡连、邹处恭、杨瑀、岑华卿、胡廷献、杨仕恭、李文龙、岑俊卿、刘文彬、赵惟翰、杨瑛、徐良玘、胡建中、岑文仲、杨得荣、张介祉。（56人）

明：车诚、胡惟彦、钱茂彰、岑宗鸮、赵宜生、岑文璧、王至、许泰、王纲、宋僖、岑袭祖、朱至善、华彦高、胡文焕、陈伯瑀、于子安、徐伯庸、王在、吴延龄、岑文皞、陈弘道、宋棠、王敬常、华彦良、赵谦、岑道安、陆雍言、陈顺洗、徐士涓、徐得名、华孟勤、赵志广、周兼善、李方、周纲、李纯卿、王旭、莫如琛、赵鸣谦、华宗善、杨子秀、陈公著、岑黼、翁善敬、许子中、岑如辕、魏廷实、虞文达、徐允恭、赵谦（再召）、徐祖厚、钱友仁、钱伯英、史孟通、高性之、景星、宋邦哲、沈永彩、张员、韩自宁、宋邦义、岑武治、孙尚礼、王景祥、邹济、施显

忠、宋虞生、陈叔刚、陆守政、方达善、周亶、宋绪、赵肤迪、宋孟徽、朱德茂、张廷玉、刘韶、莫如琛、虞焕、周徽、项端、舒子占、夏昂、魏廷柏、陈贲、潘楷、宋楷、胡渊、魏瑶、王深、陈兰、方端、邵昕、杨文奎、华采、岑琬、周思济、邵曦、赵颢、岑琬（再召）、魏溥、陈策、庄铎、杨滚、许龙、周礼、徐子元、管宗圣。（108人次）

清：高士奇、黄宗羲、徐沁、邵坡、陈梓、邵云霄、谢应雷、邵晋涵、张羲年、张廷枚、朱灿。（11人）

科举鼎甲魁首名录

状元 宋：莫子纯、方山京。**明：**谢迁、王华、韩应龙。（5人）

榜眼 明：黄珣、孙陞、毛惇元。**清：**诸重光、邵瑛。（5人）

探花 明：谢丕、胡正蒙。**清：**卢文弨、朱兰。（4人）

会魁 明：陈清、华福、邹轩、王守仁、黄堂、谢丕、陈垲、陈陞、胡正蒙、孙鑛、诸大圭。（11人）**清：**邵昊远、卢琦。（2人）

解元 明：黄珣、谢迁、孙昇、胡铎、孙清、谢丕、孙继先、张怀、诸大奎、孙思述、姜镜、张绍魁、毛凤起、宋宾王。（14人）

清：徐景范、邵奏平、谢宜相、邵大业、岑兆松、翁元圻、陈锦。（7人）

经魁 明：刘辰、戚澜、陈咏、胡宽、李居义、闻人景辉、石塘、王华、蔡钦、翁健之、毛实、黄猷、孙燧、韩廉、方玺、诸忠、陆栋、李时让、沈德章、陆幹、胡悦、陈焕、龚辉、杨抚、史鹄、陈垲、周如底、俞介、许来学、吴轶、夏惟宁、于廷寅、孙汝贤、陈陞、黄釜、邵漳、胡造、邵峻、姜天衢、孙汝资、张岳、史钶、李槃、邵梦弼、陈谟、王先鋹、李安世、杨国肇、邵秉节、戴长治、罗宸。（51人）

清：邵弘堂、孙櫟、冯翊飞、孙仁锡、胡邦翰、邵是桷、邵晋涵、邵瑛、叶润、杨学琴、谢祖铨。（11人）

亚魁 清：诸嘉乐、汪墉。（2人）

武状元 清：孙琮夏。（1人）

武会元 明：孙堪、清谢文。（2人）

武解元 明：周书、徐世卿、丁世美、徐邦达。（4人）

清：戚师塘、胡九如、吴大勇、张景违、（4人）

武科三中式 明：潘栻、徐锐、钱如山、胡宗京。（4人）